

LUNLIXUE YU
DANGDAI ZHONGGUO WENHUA JIANSHE

葛晨虹 主编

伦理学与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借

伦理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葛晨虹 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 葛晨虹主编.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178-3014-6

I. ①伦… II. ①葛… ②陈… III. ①伦理学—关系—文化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G12②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521 号

伦理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葛晨虹 主编

责任编辑 沈明珠 张 科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33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014-6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使命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成就的背后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就中国社会来说,这种文化力支撑只能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现代创新性转型中所建构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既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内核。与之相关的是,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既包括了对伦理理论的研究,又包括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伦理解释,即正确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内蕴的伦理精神与道德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伦理解决思路。围绕这些文化命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和浙江省伦理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伦理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伦理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主题,热烈而深入地探讨了一系列问题。

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力研究

与会者赞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力关系的一般性命题:任何形态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定内蕴了某种文化力的支撑。没有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既无法解释,也不可能持续。学者们的交流主要涉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使命问题,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须建构一种新的更具有真实普遍意义的文化逻辑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帝国逻辑,由是开创出适合当代中国自身特色与发展进路的文化精神与伦理、道德。有学者从“贫困”与“文化”之间关系角



度论证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问题,指出贫困问题必然会导致文化贫困,反之,贫困文化也会加剧贫困及各种社会问题。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与企业发展方面:学者们关注了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力问题以及企业发展的文化力问题。有学者指出,浙学传统、浙江精神无疑是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源泉。在企业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学者通过介绍日本“伦理法人会”的理念与活动,探讨了中小企业经营的有效性与持久性,指出伦理化经营是对经营伦理的文化意义,并论证了“敬爱与感恩”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文化力机制。也有学者认为价值观是企业之魂,其建设的着力点是:树立以质量为道德底线的价值观、遵守以法治精神为基础的公正观、坚持以安全发展为企业理想的伦理观。另有学者关注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建构政治性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框架,以便其更合理地接纳国际上更加严格的法律和道德规范问题。

二、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毫无疑问,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乃是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一项重要时代任务。这也是本次学术交流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自信,固然要考虑国家的独立富强目标指向,但同时更应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建作为其根本的价值旨归。这是文化自信最高境界。有学者则从人类学研究视角阐明了文化自信建构的基本进路,指出,一方面,基于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产生原因的逻辑进路,文化自信建构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文化自信的建构应当葆有并光大自身的传统,但又要避免夜郎自大式的文化自我主义。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的实质是要通过深入到中国文化历史的本根性中论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合法性。还有学者提出,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找到中国文化独特基因,不要以西方思维范式考虑中国问题。有学者认为,文化自信的研究,首先当须确立文化自觉,对文化内涵不能贴标签,理论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才能树立文化领导力,加强文化影响。有学者认为,从道势论视野把握文化自信,据此剖析中国历史悠久辉煌奥秘,并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应取向德性引导、新大同理想,并走自主创新之路。还有学者关注了文化自信的内涵问题,把文化自信解读为观念、精神层面的自信。

三、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

历史蕴含现实,它既为现实提供镜鉴,又为现实提供乳汁。如何利用以及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第一,家庭伦理。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家庭伦理中的“孝”问题关注较多,有认为,现实中未成年人缺乏孝心,主要原因出在父母,孕而不生、生而不养、养而不育关闭了三道孝门,而功利主义教育则加剧了孝心丧失。改善这个问题的阿基米德点就是修复撕裂的亲子关系。有学者认为,孝的根基是慈,应从历史角度分析孝的内涵变迁,把握孝的度。也有学者在孝与养的问题上有所阐发,指出,孝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第二,关于家风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家风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的基础工程,可以通过怡养涵育、返本开新、日常养成、多元互动等途径加以涵养。另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中的家风是家规、家法、家训、家教等思想意识的综合,其本质已形成教育说、家规说、价值观说、习性说等四大观点,在经历了撕裂、沉寂和苏醒之后,现正面临复兴。第三,关于当代文化建构中的包容与信任问题。有学者认为急剧的时代变化凸显了包容的重要性,在一个渴望信任而信任匮乏的时代,社会还面临着从私人信任到公共信任的现代性转型,在这种态势下,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及其建构就成为一个迫急的文化与实践命题。有学者认为要从关系思维中把握包容,并认为儒家很包容。有学者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了包容文化建构的基本进路:儒家文化何以具有包容性?包容的目的是什么、底线是什么、主体是谁?等等。第四,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其创新。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其一,乡村文化的伦理治理功能。有学者指出,乡村文化具有塑造精神家园、规范村民行为、凝聚价值共识和整合社会等伦理治理功能,但面临弱化趋势,亟须加强。其二,慈善与功利。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慈善文化面临的问题是商业与慈善的界限日益模糊,过度的功利追求导致了慈善的异化。传统的慈善伦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在慈善文化的建设方面,在慈善动机上要分类、分层,并在德法并举中引领和规范慈善文化建设。其三,有学者提出,东西文化各有其内在逻辑,这意味着我们文化创新要有自己的进路,莫基于文化反思基础之上的综合文化创新是唯一正途。这种文化创新要以自身文化为根,兼容并包,发展自己。



四、社会治理与伦理文化功能

社会的主体是人,人是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尺度和归宿。与会者认识到,社会治理离不开伦理的合法性支持。德治与法治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关注度极高的问题。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德治与法治的深刻意蕴、实践机制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意蕴主要指法律源于道德、现代德治置身法治框架之下、道德与法律功能互补,要发挥伦理作用以避免法治专横。有学者提出,道德滋养法治的根本依据在于法律的逻辑起点与法治的逻辑终点都在于道德,滋养途径主要在于普及道德知识,使得立法者、执法者等都成为道德人。还有学者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绳之以法三个层次,指出,在不同的层次,应当区别对待社会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学者们还关注了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服务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等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从制度伦理化、政府改革和公民精神三个方面增强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必要性与实践机制;另有学者则解读了保护城市建筑遗产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系问题,提出,在“保护什么”问题上存在“厚薄伦理价值”之分,在“怎么保护”问题上提出实质性与合理利用两原则。还有学者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新媒介机制的分析,阐明了新媒介空间的社会治理意义。

五、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

理论的澄明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对重大现实问题出现歧见往往出自基本理论的模糊。会上部分学者对一些重要的伦理学基本理论做了探讨。有学者论证了伦理的起点问题,认为伦理学的起点在于“我是人”这一命题,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关于自由问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运动或革命克服异化,以实现人的自由。这为批判各种混乱的自由观提供了思想武器。另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的自由论,认为马克思的自由论对利己主义持批判态度,并强调个人自律,只有自律才可能出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等。当今世界发展,全球化已成不可逆之趋势,文化研

究亦当顺其势而作为,道德问题的考察同样也须奠基于全球化的视野。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建构,则文化自信的建构既要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与立场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片面的全盘西化及片面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优越性的立场都偏于极端而不可取。文化自信还与文化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自信意味着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与自觉传承;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意识到自身传统文化并非绝对价值,从而在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与互促中实现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创进。这即是说,奠基于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文化创新是唯一的正途。

整体地看,本次学术交流充分彰显了与会学者学界视野的开阔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体现了学者们自觉的伦理研究使命意识:面对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当代社会建设、复杂社会治理等问题,积极从文化视角剖析成因并提供解决思路,尤其是作为文化的核心因素,伦理道德存在何种发展规律、如何建设以及如何为解决社会问题发挥其独有的文化功能。这种使命感鲜明地体现在本次会议的每个议题之中,并成为学者们的治学方向。

目 录

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研究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家园重建	曾建平	邹平林 / 003
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贺汉魂	许银英 / 018
先秦儒家的孝道观	丁成际	/ 031
孙冶方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刘 琳	/ 040
为善去恶:葛洪之善恶观析论	陆爱勇	/ 054
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	田海平	/ 064
中国家风的多维本质、历史本原与现代境遇	王常柱	/ 076
孟子的家庭伦理观及其当代意义	王亭慧	/ 088
关于伦理文化变迁史观的检视	周忠华	/ 095

伦理与社会治理研究

意识形态与国家社会的文化治理	葛晨虹	/ 109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文化基础	郭广银	/ 119
发挥乡村文化的伦理治理功能	何建华	/ 125
指向信任问题的治理术	陆 青	/ 137

论政府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提升的途径	聂静港 / 145
以优秀家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牛绍娜 / 156
追寻贴近民众实践的生活伦理学	肖群忠 / 167
论职业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 霄 / 173

经济伦理研究

如何有效推进中小企业的伦理化经营

——以日本“伦理法人会”的思想与实践为例	龚 颖 / 185
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政治转向”	苏令银 / 192
企业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几个着力点	朱金瑞 / 207
“经济学帝国主义”批评与反思研究述评	赵 昆 / 210
慈善与功利关系新探	周中之 / 219
伦理文化视域中契约的价值解析	钟锡进 / 230

当代中国文化的伦理维度

休闲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论析	郭力源 / 239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伦理审视	贾雪丽 / 251
城市空间重构:权利生产与伦理自觉	陈进华 祁文博 / 259
论近代家庭道德生活的现代转向	李桂梅 / 270
当代中国知识产权伦理观的构建	彭立静 / 280
基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建筑遗产保护伦理	秦红岭 / 294
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文化使命	吴灿新 / 305
社会热点事件的新媒介机制研究	郑根成 / 314
贫困问题的文化审视	龙静云 / 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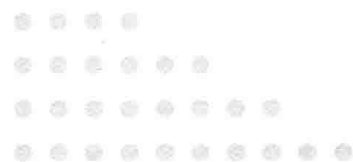
宗教伦理研究

佛学视域下王阳明批禅之伦理维度研究	丁建华 / 347
-------------------------	-----------

国外伦理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由与异化	成海鹰 / 357
苏联历史理论视野中的价值问题	武卉昕 / 367
道德能力、自由与公民平等	
——对罗尔斯“平等的人的理念”的解读	李金鑫 / 381

**传统文化与
文化自信研究**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自信与精神家园重建

曾建平^① 邹平林^②

【摘要】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承继之后,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提起的文化自信问题,已经有了很不相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表现形态,因而也就理应有其不同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指归。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化自信,固然要将提升文化软实力并从而更好地谋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振兴作为其重要的目标指向,但同时更应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建作为其根本的价值旨归。这一方面是因为,构建人们得以在其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本来就是文化最为本质的功能,而中华民族自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强势冲击而陷入空前危机以来,就迟迟未能有效地构建起其共有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其社会伦理生活得以合理优化以及其文化软实力得以有效提升所共享的基础性前提,也是文化自信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精神家园

2017年颁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推动力。”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承继之后,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提起,已经有了很不相同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表现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它应当有不同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通过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心路历程的梳理,阐明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自信的言说背景和表现形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应有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从而更准确地

① 曾建平,博士,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井冈山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② 邹平林,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与重点。

一、文化自信主题的历史性凸显

文化并非一种外在地给予人们的抽象事物,而是人们自身生活实践的内在产物,人们就生活于自身的文化之中并被自身的文化所熏陶、塑造。对于生活于某种文化之中的人们而言,这种文化乃是孕育其精神生命的自然而直接的“母体”。若非遭遇重大的变故或危机,人们很少会对自身生活于其中且“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进行自觉地审视、反思与批判,正如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很少会对其母亲进行审视、反思和批判一样。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也就很少会明确地将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正如通常情况下人们很少会将母亲的信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一样。

即使一个民族遭遇到了重大的变故或危机,但如果这种变故或危机不是来自其他民族或其他文明的冲击或入侵,而是来自相对封闭、相对独立的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内部,或者说这种变故或危机只是指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应对新环境、新条件、新问题时所遇到的困境或难题,那么,即使人们会对自身文化做出一定的反思、批判并进而做出一定的调整与革新,但这也往往只是在对自身文化整体有其朴素信赖前提下的一种局部性的反思与批判、调整与革新,而并不触及文化的整体根基或根本前提,因而也就并不真正涉及“文化自信”问题。正如当一位母亲沿用既有的方式来应对新环境、新问题而陷入困境或与子女的应对方式发生矛盾冲突时,其子女可能会对母亲的某一或某些具体做法有所反思和批判,但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一般都不会因此而产生对母亲的整体性怀疑与否定。

只有当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所遭遇的变故或危机来自外部时,即当一种文化与其他异质性文化相遇而发生对比、激荡和冲突并在这种对比、激荡和冲突中处于劣势、陷入危机时,人们才开始将自身文化作为对象来加以整体性地审视、反思和批判,才开始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对自身文化做出一种好坏优劣的整体性判断,从而表明一种或自卑或自信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整体性立场与态度。正因为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了不同的判断并进而有了不同的立场与态度,所以文化自信才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而作为一个必须予以关注的“主题”凸显了出来。正如一个人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获得其明确的自我意识一样,一种文化也只有在与“他者”的对比、激荡和冲突中,才能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

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也才能因此而获得自觉而明确的文化意识。并且只有在与“他者”文化的对比中,人们才能形成关于自身文化之好坏优劣的整体性价值判断,并从而形成关于自身文化的或自信或自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立场与态度。

上述分析表明,文化自信并非一个常规性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性地呈现出来的非常规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之所以是“历史性”的,乃是因为一方面,只有当一开始相对分散的民族文明经由漫长且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而进入“世界文明”的历史阶段时,异质性文化之间的对比、激荡与冲突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一旦人类文明必然性地进展到了“世界文明”的历史阶段,异质性文化之间的对比、激荡与冲突就必然会发生,从而对那些被卷入到这种对比、激荡和冲突中并在这种对比、激荡和冲突中处于相对劣势的民族来讲,文化自信就必然会作为一个“问题”和“主题”凸显出来。换句话说,从世界历史而非从单个民族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作为“问题”和“主题”被凸显出来,是必然而非偶然的。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承继了一百多年的文化自信问题,正是这样在近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而历史性地凸显了出来。

中华民族自其形成以来,从未在整体上丧失过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这倒不是因为中华民族从未遭遇过变故、磨难、挑战与危机,相反,中华民族在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变故、磨难、挑战与危机,如自然灾害、改朝换代以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这些变故、磨难、挑战与危机也曾激发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批判、调整与革新,但却从未触及文化的整体根基,从而也就从未动摇人们对自身文化根基所具有的那种朴素而深沉的坚定信心。在没有其他文明更先进的应对方法作为对比和参照时,自然灾害一般不会将人们引向对文化的反思,即使有某种对比和参照将人们引向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也往往只局限于经验技术层面,而不触及作为文化之核心根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国无数次的改朝换代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或许对前朝的具体做法有所损益,但制度的基本框架以及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根本精神却始终得到相对完整的延续,而这种不断的延续无形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之合理性的确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固然会对中原主流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总体上远远落后于中原主流文化,所以少数民族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权,但在制度和文化上都无一例外地沿用了中原主流,而其自己的原有文化则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被中原主流文化所消化、吸收,这也同样在无形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与



世界上其他民族之间的文明交往也是如此,事实上,由于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不仅东南亚民族因受中华文明的强势影响而可直接归入“中华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而且远在欧洲的西方各民族也从中华文明那里受惠颇多,因而也往往是以仰慕者的姿态来与中华民族进行文明交往。总之,由于中华文明自身强大的包容力、生命力使其有了几千年的完整延续,由于其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无可争议的优势,培育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朴素而又深沉的坚定自信。也正因为人们对自身文化有足够的自信,所以几乎就未曾想过对自身文化有没有自信这样的问题,更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提出来。

然而,当中华文明自近代以来逐渐走向封闭、腐朽、没落时,西方文明却开启了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新时代。不断扩张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开发、建立联系,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从而使一切民族都被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总之,资本主义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共处一室的中华民族,自然也免不了被卷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去。当悠久而“落后”的传统中华文明遭遇到新兴而“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时,几乎毫无抵抗能力,不可避免地惨遭蹂躏并很快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中。

面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入侵以及由此造成的深重民族危机和文明危机,人们不得不将自身文明拿来与强势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做对比,并从而开启了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与批判。由于这一次面对的是极其强势而又完全异质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因而由此激发的对自身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就必然由表及里、逐层深入而最终进展到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反思与批判,必然导致人们对被认为是文明之根本核心的文化的不同判断、立场与态度,从而导致或自卑或自信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复杂文化心态。但无论不同的人们对自身文化做出怎样的判断、持有怎样的立场与态度,在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比、激荡与冲突中,人们毕竟要对自身文化有所判断、有所立场和态度,原有的那种对自身文化的朴素而深沉的坚定自信因此而成了一个有待求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自信被那些对自身文化仍有自信或自认为对自身文化仍有自信的人,作为一个“问题”同时也作为一种“要求”或“希望”提了出来。